

陈文贵: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第一人

重庆市永川区档案馆珍藏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,里面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:“1941年11月4日5时许,敌机一架,于大雾弥漫中,在常德上空低飞,投下小麦、黄豆、棉絮及其他不明物体。7日后,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发现……”这是永川籍细菌专家陈文贵撰写的《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》复印件,他是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第一人。

撰写万言报告书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

1941年冬天,湖南常德突然暴发了一场鼠疫,许多民众感染后死亡。

贵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陈文贵接到紧急任务——带队赶往常德,秘密调查鼠疫事件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、调查和验证,且亲自主刀解剖死难者遗体,陈文贵最终得出结论:常德突然暴发的大规模鼠疫,是日军通过抛撒霍乱和鼠疫病菌所致。1941年12月12日,陈文贵写下了万言《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》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后,远东国际法庭指派法官来到重庆,陈文贵陈述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事实,并在英文版报告书上签了名。该报告书成为国际法庭审判日军侵略者实施细菌战的有力罪证。

1950年,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清理国民政府卫生署档案时,发现了这份报告书原件,

民众才得知日军曾经在常德实施了细菌战。这份报告书第一次全面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,陈文贵也成了揭露侵华日军实行细菌战的第一人。

研制疫苗,支援抗日战争军民防疫所需

陈文贵1921年考入湖南雅礼大学医学预科,后转入湖南湘雅医学院学习。1927年,北伐军新成立第11军24师,师长为叶挺,陈文贵担任该师卫生队队长,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。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,国民政府军医署决定在全国建立三支防疫大队,陈文贵担任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。在南京期间,廖承志介绍陈文贵前往西安组建第一防疫大队。1937年12月,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带领下,陈文贵用军用车运送了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到延安,还在延安组建了第四防疫分队。后来

因特务告密,他的大队长职务被撤销,他愤然离开了国民政府军医署。

后来,陈文贵在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,针对贵州地区多地发生霍乱、鼠疫等疫情,他用土法研制和生产了大量疫苗,对遏制疫情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。

陈文贵的小女儿陈晓晴曾透露:“父亲对医学态度十分谨慎,他不仅用动物试验疫苗,还在哥哥、姐姐身上进行人体验证,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,才用于救助民众。”

冒险在战场上收集美军细菌战证据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陈文贵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,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1950年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美军在朝鲜战场也进行了细菌战。为此,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派陈文贵赶赴朝鲜,任



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。陈文贵冒着生命危险,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,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、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,并用科学方法从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、霍乱杆菌、伤寒杆菌等病原体,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。

1952年12月,陈文贵随宋庆龄前往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。会上,出示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证据。朝鲜特授予他二级自由独立勋章。回国后,陈文贵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
1961年,他从北京回到家乡,在四川医学院(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)任副院长。1974年,陈文贵在成都逝世,享年72岁。如今,在永川博物馆,塑立着一尊陈文贵雕像。

(摘自《重庆晨报》9.16 徐昌斌/文)

珍·古道尔:九十岁的火种

的驱动力,支撑着她在耄耋之年仍以每年300天的强度在全球奔波。

给黑猩猩起有趣的名字

珍·古道尔1934年4月3日出生于伦敦,几时就展现出对自然的热爱。她的卧室里曾摆满了蠕虫和海蜗牛。大约5岁时,对生命奥秘的好奇心驱使她一连几个小时躲在黑暗的鸡舍里,只为观察小鸡下蛋的过程。她完全没注意到家人正在疯狂地寻找她。当她最终带着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跑出来时,母亲没有责骂,而是耐心地倾听了她人生中第一次“科学观察”的报告。

母亲给古道尔买了《杜立德医生的故事》和《泰山》等关于动物与冒险的书籍。年幼的珍·古道尔被“泰山”的世界迷住,甚至坚持要在树上做作业。

“正是幻想着和‘泰山’一起在森林里的生活,让我下定决心要去非洲,和动物们一起生活,并写一些关于它们的书。”

尽管未能进入大学,但她从未放弃非洲之梦。1957年,



她终于抵达肯尼亚,见到了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·利基,并担任了他的秘书。1960年夏天,在利基的帮助下,26岁的珍·古道尔走进了坦桑尼亚的贡贝河保护区。

抵达贡贝不到一年,古道尔就获得了黑猩猩们的友善对待。在第二年年底,一只她命名为“灰胡子大卫”的黑猩猩,第一个允许她进行身体接触。她轻轻地抚摸了它,并为它梳理了整整一分钟的毛发。

黑猩猩会使用工具。这一发现颠覆了“人类是唯一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”。当她将报告发给利基时,他回复道:“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定义人类,重新定义工具,或者接受黑猩猩是人类!”这篇论文

于1964年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。她也因此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。

她的研究方法充满了革命性。她坚持为研究对象黑猩猩取名字,如“Flo”“Fifi”“David Greybeard”,而非冷冰冰的编号。她记录它们独特的个性、复杂的社会关系、情感,甚至观察到了它们捕猎、食肉的行为。

“根与芽”

她于1977年创立的珍·古道尔研究所,成为她推动保护、研究和教育工作的核心平台。而真正将她的理念播种到未来的,是她在1991年创立的面向全球青少年的环境教育项目——“根与芽”。该项目旨在鼓励年轻人围绕环境保护、动物保护和社区关怀开展实际行动。如今,“根与芽”已遍布全球130多个国家。

珍·古道尔于1998年首次在中国发表演讲。一年后,“根与芽”项目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办公室,她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,推动青年主导的环保行动。(摘自《新京报》10.9 李冰洁、朱月红/文)



名家笔下忆重阳

重阳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俗传统,我们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重阳和秋色之美。

丰子恺:重阳夜宴,以吃蟹为中心

重阳等节候上,缸里的蟹就满了,那时我们都有得吃,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,或一只半……在深黄昏,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。更深入人静,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,恰好围成一桌,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。谈笑,看月,他们——父亲和诸姊——直到月落时光,我则半途睡去,与父亲和诸姊不分而散。

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,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。故这夜宴……有蟹的节季里的月夜,无端也要举行数次。不过不是良辰佳节,我们少吃一点,有时两人分吃一只。我们都学父亲,剥得很精细,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,都积受在蟹斗里,剥完之后,放一点姜醋,拌一拌,就作为下饭的菜,此外没有别的菜了。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,且他说蟹是至味。吃蟹时混吃别的菜

肴,是乏味的。我们也学他,半蟹斗的蟹肉,过两碗饭还有馀,就可得父亲的称赞,又可以白口吃下馀多的蟹肉,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。现在回想那时候,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,这滋味真是好!自父亲死了以后,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。现在,我已经自己做父亲,况且已茹素,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。唉!儿时欢乐,何等使我神往!

——选自《忆儿时》

二月河:『不认真』的游兴节

这个节是游兴节。——过去说的“游兴”,就是今日的:旅游。

“重阳将至,盲雨满城,凉风四起,亭亭落叶,陇首云飞”。就这么几句话,可以说是形容重阳的极致之语,我在不少笔记文章中见到,几乎都一字不易地引用。这个时气,不下滂沱大雨,然而也不是毛毛雨,很细腻柔和如烟似雾那样的雨,重阳节也没有,盲雨的“盲”怎么讲,我没有考究过,想想见到的那雨的样子,该是不大不小的中雨,更确切地说是“中雨偏小”的那种雨,这个雨,出门登高作一日游,怎样说都是偏大了一点。但人,人啊,只要有心情,高兴,带点雨具,挑上酒食点心,也就上山了。那是什么样的盛况?清人申时行有诗:

九月九日秋色嘉,吴山胜事俗相夸。阖闾城中十万户,争门出席纷如麻。拍手齐歌太平曲,满头争带茱萸花

……

其实,就人们的心理,人们盼着有雨。满山的秋叶艳色杂陈,斑驳陆离,如果在艳阳之下,那就太真切了,不够朦胧,不够含蓄,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多少有点不合。在太阳底下喝酒,看山也少了点“秋凉”意味。但还有一层更真切实惠的想法:“重阳无雨则冬无雨雪”,这会影响来年的收成,所以雨下起来,敲打着所有人的兴奋点,敢情是雨下得多点大点,人们会更高兴。

插茱萸,饮重阳酒、吃糕、登高,寄托了人们两种心情:希望远方的亲人平安,希望自己的子女和生活“步步登高”,这实在是个吉庆有余的欢乐节。

——选自《重阳随想文》

季羨林:重阳庙会,颇有点动人气势

每年到了旧历九月初九日,是所谓重阳节,是登高的好日子。这个节日来源很古,可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。济南的重阳节庙会(实际上是并没有庙,姑妄随俗称之)是在南圩子门外大片空地上,西边一直到山水沟。每年,进入夏历九月不久,就有从全省一些地方,甚至全国一些地方来的艺人会聚此地,有马戏团、杂技团、地方剧团、变戏法的、练武术的、说山东快书的、玩猴的、耍狗熊的等等等等,应有尽有。他们各圈地搭席棚围起来,留一出入口,卖门票

收钱。规模大小不同,席棚也就有大有小,总数至少有几十座。在夜里有没有“夜深千帐灯”的气派,我没有看到过,不敢瞎说,反正白天看上去,方圆几十里,颇有点动人的气势。再加上临时赶来的卖米粉、炸丸子和豆腐脑等的担子,卖花生和糖果的摊子,特别显眼的柿子摊——柿子是南山特产,个大色黄,非常吸引人——这一切混合起来,形成了一种人声嘈杂,歌吹沸天的气势,仿佛能南摇千佛山、北震大明湖、声撼济南城了。

——选自《九月九庙会》

倪貽德:来一趟蹄声得得中的秋游

如今佳节又近了重阳,寥廓的天空,只是那般蔚蓝一碧,灿烂的骄阳,想已把青青的郊原,晒成一片锦绣的华毯;葱郁的林木,染为几丛灼嫩的红叶了罢。紫金山麓,灵谷寺前,正是秋色方酣的时候。当这样的佳景,这样的令节,我们应当怎样地去遨游寻乐,才不致辜负这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幸福呢!

于是我们又踏过断壁残垣的明故宫,走出了午朝门,在城脚下个驴夫那里雇了几匹驴子,蹣跚地直向前面山道中进行。山道是迂回曲折,高低起伏,驴儿也跟了它一蹬一颠的缓步,或左或右地前进在驴背上一路的贪看着荒山野景,饱尝了许多以前所未曾接触过的清新的美

点来,这美点倘若要精细的描写出来,抽象的文字恐怕还嫌不足,最好是用具象的绘画,或者可以更直接更真的华毯;葱郁的林木,染为几丛灼嫩的红叶了罢。紫金山麓,灵谷寺前,正是秋色方酣的时候。当这样的佳景,这样的令节,我们应当怎样地去遨游寻乐,才不致辜负这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幸福呢!于是我们又踏过断壁残垣的明故宫,走出了午朝门,在城脚下个驴夫那里雇了几匹驴子,蹣跚地直向前面山道中进行。山道是迂回曲折,高低起伏,驴儿也跟了它一蹬一颠的缓步,或左或右地前进在驴背上一路的贪看着荒山野景,饱尝了许多以前所未曾接触过的清新的美

徐志摩:游子归乡的心绪

故乡欢迎我的仪式如此盛大
大路,小道两旁以及所有的山坡
都站满了菊花
那些有名字的,没名字
都仰着小脸看向我回家的路口
不用低头
一股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

那是山村的气息
那是母亲端出的菊花茶
咽一口,我醉倒在乡愁里

多少年了
我的小雏菊仍然是当初的模样
怀抱一团正艳的菊花
我想起了他
那红,黄的
恍如隔世的情话
那淡紫色的
才是这些年我寄回的梦

就那么小巧而幸福地
开在深秋的风里
——选自《重阳节的菊花》

瑙般的鲜明;也有黄的了,黄得如油菜花般的娇艳;也还有绿的,那仿佛还在长夏时一般的滴翠;后面有红墙古屋的衬托,上面有蓝天的掩映!这又好像是我的一个好友曾经在那里表现过的一幅画境。

我这样的在驴背上默默地看着想着,其余的几个朋友也都默默,这空山之中,除开得得的蹄声,也没有鸟鸣,也没有虫鸣,也没有人语,大概这时候,大家受了大自然的引诱,都不知不觉的为它伟大的力量所慑伏了。总之,我们好像已经不是现世的人,而变成了中古世纪浪漫时代的人了;我们已经不是现实的人,而变成了山水画中点缀的人物了。

——选自《秦淮暮雨红叶》